

知识产权之争背后的产业之殇

■文/赵军

近日行业编剧群起责难割窃、抄袭、伪造创作者名一时蜂拥,引起了内外广泛关注。事情也许不会短时间内消停,而电影产业如此现象带来的思索则理应有更加深刻的探讨,对于涉事者已有结论处理外,如何形成遏制机制,如何在道德法庭传播正义的声音,纯净产业环境,庶几迫在眉睫。

中国电影行业当下最薄弱环节就在编剧一环。三种情况:一是苦于编剧难找。中国从古到今题材极其丰富,但善于编故事者寥寥,过编剧训练的人才实在稀罕。而且仅仅受过训练远远不够,编剧也有天才与工匠之分,高级的工匠罕见,一般的人才也不多,制片方如果初涉影坛,受制于这种状况而被骗的可能性很高。

一些处心积虑欺世盗名者将之视为机会。他们或者割窃或者冒名或者打着“致敬”的幌子如假包换地翻炒世界名片。这些现象在近些年的剧本“创作”中屡见不鲜。能够辨别真假“编剧”的制片与投资入不多,骗子照照攘攘于途。没有遇到好编剧,奉劝投资者止步。

二是假编剧愈益猖獗,因为看到产业管制目前漏洞尚多,而一部著名影片带来的名利吸引力极大,怀有侥幸之心者视为捷径。问题要害就在于人心不古而法网不严。投资人编剧难觅伤害的是一个入,欺世盗名之徒骤起则伤害的是整个产业。

我们今天不能说“躲起”,但是,个案背后依旧潜伏着更多没有被揭发出来的则是无法回避的蚁穴。产业与行业必须重视编剧的创作劳动以及将之恢复至一部影片的第一创作地位,让编剧劳动得到真正的尊重,令假编剧目之而怯步,方可以剿灭其侥幸之心。

三是如何看待编剧的酬金问题。艰苦而卓越创作与欺世盗名不可以同年而语。但是要标准划一在复杂的市场条件下目前难以做到。名编剧除了剧本的价值之外往往还有“名”的无形价值,无疑这是能够帮助项目方进行融资的。酬金价格常常难住投资方,但是也让欺世盗名者得以猖獗,更铤而走险。他们便是从中获得不义之财者。

酬金价格并非无法克服,只要是市场行为,标准与弹性总是有的。但是假借名片效应和名人效应行诈骗手段,不惜掠取高额酬金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产业的命脉一贯在于平台和资本,但是创造力才是第一的。文化产业虽然只是一个中国概念,但是只要是文化领域的存在,创造便居于首位。文化就是创造,并且是创造出物质形态的过程。中国直截了当地指出所以文化就是产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写成文字,不绘成画幅,不打造出雕塑,不生产出一部机器或者开拓出一条道路,都不能够称之为“文化”。

文化是精神向物质的转化过程,所以尊重文化包含的“知识产权”,不仅仅因为文化的精神属性,并且尊重文化的物质属性,而知识产权正是包括着精神和物质的计量的,所以知识产权也是一个重要的物质概念,这和说精神财富似乎就是说说而已不同。知识产权代表巨大的可以定量且定量无限延伸的物质财富,这毋庸讳言。

别以为精神财富即可肆无忌惮说掠夺就掠夺,盗用著名作者和著名影片的名义及名誉就是盗窃物质财富。

最近编剧王兴东、陈宝光上诉某使用同部影片编剧名义侵权者一案判决,罚款十二万,要求被告

登报道歉消除恶劣影响。

对于此案当中被告割名窃窃的行为必须严惩以儆效尤。而原创者经过多年积累,辛勤构思,形成完整版权,授权制片单位拍摄成片,其中之创作转化成物质财富已然得到固化,其蕴涵物质财富的原创权利应该受到尊重。电影编剧能有饭吃,全凭这种来自心血的劳动。案件被告盗名欺世、招摇撞骗、诈取不义之财,应该受到全行业的抵制。

所以上述该案侵犯名誉权和知识产权赔偿金额的法院判决,就没有彻底厘清维权者与盗名者之间的法制本质,实际上是随意的而与法治精神毫无关联。根据上述的研究分析,可以说,其首先就没有将一场侵犯权利的索赔与相关受法律保护的物质财富的属性联系起来。很显然,如上所述,这是不合适的。

计算编剧被侵权而应该通过索赔获得的金额,应该根据该影片付给编剧的稿酬数额由被告按照同样数额进行赔付。侵权者在多少部影片编剧合同中和附带提供的个人资料里使用了所盗引影片的片名,其在该部影片中获得的稿酬,都必须列入罚缴并支付与被盗引影片真正编剧的范围。

影片的编剧酬金额度自有市场价格以来,就是以影片投资将要呈现出来的物质财富属性和市场预期收益目标为标准的。这里不存在“酌情”支付酬金的问题,而欺世盗名者所盗当然也不是一个虚有的片名,而是片名和影片编剧背后的物质财富。这一切都可以根据上述对于影片的市场、物质、财富属性之分析而全部得到认证。

人性的立场总是基于物质存在的辨证的,因此对于丑恶的人性行为不能容忍也不能仅仅给予精神、名誉上的批判与声讨,或者追究不痛不痒的少量物质利益惩罚。人的权利首先必须是物质财富体现的权利以及自由与安全的权利。物质财富、自由、安全,三者放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权重很容易看清楚。我们把物质财富方面的惩罚与支付给予突出强调,是因为它的权重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占据上风、不言而喻。

保护电影产业中编剧的地位和作品的价值就是保护电影产业本身。目前产业之于编剧链条有三需求:一是更多的编制和更好的剧本,满足愈益增加的产业投资需求;二是更深入的学习,更创新的追求,使得剧本更能够符合时代的要求与人性的本质;三是保护好自己知识产权,敢于向欺世盗名者说不,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整个产业的健康和安全。

同时整个社会都要支持优秀编剧的维权工作,要破除侵犯知识产权不算大罪的糊涂意识,要看到保护编剧的维权就是保护产业的生存与发展,要在当前最新的一两个案例中实施量刑的物质财富与市场利益标准,要让欺世盗名者真正“身败名裂”,所谓“败”就是付出足够的物质财富代价直至其倾家荡产。

中国电影产业的法律责任型塑造未有穷期,近年来各种钻法制漏洞而行诈骗掠夺的影视圈犯罪行为层出不穷。欺世盗名者有之,集资诈骗者有之,恶意违约者有之……影视圈不仅仅只是名利场了,它已经成为某些冒险者的“天堂”而径直以身试法、堂而皇之。时辰未到吗?不,请为不法之徒敲响丧钟!请看国家已经如何对资本大鳄、垄断大鳄、权力腐败者痛下管理力度吧,时辰已到。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拆弹专家2》：“邱氏精神病学犯罪片”

■文/周丹

是时候说说邱礼涛了,用《伊博拉病毒》带给我挥不去的童年梦魇的邱导,多年来都被低估了。香港史上唯一一部三级片捧出金像帝帝的《人肉叉烧包》年代久远不提了,《扫毒2》不仅成为刘德华票房最高的影片,更以神经质的躁都在高手林立的港式犯罪片中独树一帜,《拆弹专家2》跟《扫毒2》一样,虽然顶了一个“2”的名头,但跟前作大相径庭,带有鲜明的邱式印记,这一次玩得更嗨,更升级,更完整,成为一部邱礼涛式的精神病学犯罪片。

电影界的精神病学专家大卫·林奇的犯罪片其实质都是精神病学犯罪片,而更广为人知的是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全片都结构于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他失眠、萎靡、兴奋、愤怒、杀戮、恢复平静,而与法治精神毫无关联。根据上述的研究分析,可以说,其首先就没有将一场侵犯权利的索赔与相关受法律保护的物质财富的属性联系起来。很显然,如上所述,这是不合适的。

影片结构： 两次精神病学治疗

说实话,陈述性记忆和植入记忆这些医学概念虽然时髦,但并不足够可信,导演也并不像诺兰那样花大力气自圆其说,只是一个设定,粗糙而粗暴的推进故事而已,这是90年代港片的特色,邱礼涛一直有意保留一些90年代港片的录像厅气质,很古着。

故事其实可以讲得更合理,比如潘一时愤怒,策划了一系列爆炸案,但第一例爆炸后平民无辜的伤亡和因此导致的昔日警员同僚的死,让他真正见识了暴恐的可怕,或者说平复了他的愤怒,他幡然悔悟,弃恶归善,拆掉了自己装置的炸弹。但这样讲,就还是一个道德故事,跟《无间道》是一系的,《拆弹专家2》讲的一个是精神病学,的故事。潘被炸弹震伤了海马体丧失了陈述性记忆,然后依据他之前的善

念和警方的输入记忆,整合成一个新的人格,简直就是脑前叶切除术的变体。精神病学史上有过几次臭名昭著的治疗实验,其一就是切除脑前叶,《飞跃疯人院》中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主角就是被施以这一手术,变成痴呆。因为负面治疗效果,这项血迹斑斑的手术被弃用。然而,在历史记载中,也曾经有一些成功手术的记载——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危险人群因为接受这一手术,而变得平和柔善宛若复生,当年美国当局也是因为看到这些成功案例才会同意推行这一手术,海马体被损,简直就是脑前叶切除的柔和版,显然潘乘风是一次成功的手术案例。

还有一种剑走偏锋的对待反社会人格或暴力狂的治疗方法,就是《发条橙》中男主角所接受的试验性厌恶疗法,通过一些应激训练,让被治疗者对暴力、成鸷等负面倾向产生厌恶性条件反射。潘看到恐怖分子狙击手居高临下点射警察,昔日同僚被杀,眼眶不禁充满了泪水,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不能走开,不能闭眼,只能一直睁大眼睛看完整个残忍的过程,就像《发条橙》中男主角被强制不能闭上的双眼。也正是在此之后,他明知道倪妮扮演的女警司在骗他,还是同意继续跟警方合作阻止恐怖分子引爆更大的炸弹。

邱礼涛的《拆弹专家2》跟《无间道》后一系列的犯罪片都不同,它不是道德交锋抉择最后重塑人格,而是两次成功的精神病手术后被动的治愈效果。医生说海马体的损伤有可能会恢复,如果恢复,当潘乘风复苏了所有愤怒的情绪记忆,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这也是全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全片的重心和支点不是主人公的道德抉择,而结构于主人公并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其他犯罪片的戏剧张力来自善恶对垒猫鼠追逐,而《拆弹专家2》的恶要戏剧张力和悬念来自于不确定你下一刻潘乘风的精神状态如何,是疯狂的反社会人格恐怖分子,还是良善的英雄警员?

观影体验： 被囚在主角视角里的精神折磨

到现在,我还记得《伊博拉病毒》带给我的恐慌,不是单纯的视听刺激,而是全片导演都设法将你囚禁在主角的视角里,去体会他的病发绝望、被遗弃孤立、出离愤怒、极致绝望。《拆2》也是一部非常残酷的电影,不仅直观的展现潘乘风的残缺,更动用了各种手段让你感同身受他的痛苦与愤怒,影片把观众高度局限于潘乘风的主观感知与认知中,比如他坚定的认为自己可以继续胜任拆弹专家,也并不相信好友和恋人自己能继续留在警队真的做出过努力,其实是,无论是警局对他的恶劣态度,还是好友和恋人并不会体会他的痛苦,而是轻易宣称他有病,仔细看这些桥段的处理都是失真的,也就是说这只是潘主观上认定的一切。

客观的事实,导演故意对观众做了屏蔽。只说一个细节,潘乘风断腿后一直在服用的药叫加巴喷丁,是治疗神经痛和癫痫的药物,潘曾经对女友说:“我不是疯,我是痴”,像他这种刚刚经历了截肢的病患往往都会有幻肢痛,而治疗这种痛病的加巴喷丁主要用于抑制中枢神经,而不良反应则是可能产生反应迟缓,精准动作失调,偶有惊厥、遗忘、神经过敏等。显然,服用此类药物的潘根本无法再胜任拆弹专家的工作,任何人都做出跟他上司一样的决定。

然而,潘偏执的认定自己可以,而影片也完全局限在他的主观视角里,放大的展现他的感受——“我没有病,是这个世界有病”,“这个没用即弃的社会,愤怒是不够的,要摧毁”。

除了用视角操控观众的感受,邱礼涛还有一系列高超纯熟的视听手段来对观众进行心理和情绪控制。首先是声音,邱礼涛特别善用高频段的噪音式音响带给观众狂躁的观影体验,跟越来越多犯罪片追求仿真的开枪效果那种枪管里撞击的闷声和划破空气的哨感反其道而行之,他电影里的枪声依然保持着香港90年代特有的

“中国版《小鞋子》”,贫困问题的中国式解决——评《点点星光》

■文/周文萍

与《小鞋子》侧重展现阿里丢失鞋子后的烦恼与困扰不同,《点点星光》并没有过多渲染孩子们的烦恼。相反,双胞胎进入跳绳队的故事带有一种天真的喜剧色彩。如两人以为加入跳绳队便能领鞋,但跳绳队规定只有成为正式队员才能领鞋,两人不得不跟随进行刻苦训练;首日训练后两人不堪其苦决定退队,不料对着老师一番抱怨后换来的是严厉的惩罚;在两人训练时,银幕上更是呈现出两人一人在方小琴指导下精益求精,一人却在任宇翔带领下苦练倒立的有趣场景。

更大的不同在于问题的解决。在双胞胎既未能成为正式队员又无力购买新鞋时,队长方小琴带着队员们翻出了跳绳队的旧鞋子给两兄弟,就此解决了困扰兄弟俩的一大难题。此一解决方式如此轻松自然,与阿里兄妹竭尽所能也无法得到一双鞋的苦闷恰成对比。这不禁令人思考造成这差别的原因,毕竟在一双鞋的烦恼后面,孩子们面对的实际都是贫困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里兄妹从始至终都只能靠自己,大海与小河却得到了跳绳队集体的帮助。这反映出中国人的集体思维,也折射出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面对庞大的贫困人口,中国人选择了以集体的力量进行帮扶。2020年正是中国扶贫攻坚的决胜年,片中的丰老师也是支教老师。

跳绳队杜老师是一个银幕上的“非典型教师”。他外表粗犷、说话简单粗暴,初看并不符合细致耐心的好老师形象。但他对孩子们教育与爱无可置疑。他一直注重培养孩子们的集体精神。新队员入队后由老队员带领训练,抱怨队员要受罚等等都是他对跳绳队制定的规则。他对孩子们人格的培养也极为重视,在大海替代小河比赛的事件中,虽然明知揭发事实会影响比赛成绩和跳绳队前途,他仍然坚持向组委会检举了自己的队伍。用他的话说:“输比赛不能输人。”比赛的输赢只是一时,人格培养却是影响孩子一生的事。

杜老师对孩子的爱是外冷内热式的。他对孩子们要求严格,要他们6点就要到校训练。孩子们抱怨天黑路难行,他表面置之不理,却在第二天清晨骑上摩托、拿起电筒去接孩子们。杜老师迎接孩子上学的场景在片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前面决定加强训练时,一次是后面出国比赛前。一前一后贯穿始终,表明了他长期的付出与坚持。杜老师也得到了集体的帮助。最直接的帮助来自从城里来支教的丰老师,她为跳绳队带来了外界的先进经验,帮助跳绳队改善了训练方式,提升了成绩。还有露面不多的校长,一直在有限的条件下为跳绳队提供支持。

有了集体的力量,鞋子对于双胞胎不再是无解的难题,在此基础上,影片不无浪漫地展现了孩子们对于梦想

夸张刺耳,单薄尖锐,炸而叱,而且非常密集,21世纪后港式犯罪片惜弹如金,而他的电影还是动不动就来一梭子,他的电影音响是极度饱和,不,过度的。人类的神经对于这类高频段噪音非常敏感,密集的一会儿,马上就会产生狂躁。

还有屏闪,和无预警无必要的爆头、中弹、血浆,都在潜意识中刺激着观众的神经。还有景别,邱礼涛的电影景别给得都很紧,还没有景深,一直把人物怼到墙上,也把看电影的观众直接怼得没有腾挪之地。

还有镜头内的运动和这些运动镜头的组接,惊慌逃散的人群,各种喧嚣的车流,总是呈现杂乱无章的运动轨迹,而一组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杂乱无序的运动镜头故意剪辑在一起,就会给观众营造一种完全不可控的无力感乃至躁郁感。

就流血浆邱礼涛都洒得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注意看躺在地上的尸体或者伤者,他们身下或者头边(因为一般都是被爆头)的血迹不像其他一些港片是呈现流淌而成的状态,往往呈现喷溅或者爆裂式的样态,同样是血迹,这样的图形对人的感官刺激要强烈得多。

片尾,倪妮扮演的女警司带着警队进入香港金贸中心控制室一段,简直是邱氏视听语言集大成者,密集无喘息的高音频段声响,关灯之后后视灯镜效果下的绿色滤镜,加上枪击在黑暗中带来的巨大的屏闪效果,其他电影里开枪时枪口的枪花没那么大,邱礼涛的电影里枪花大得刺眼,而枪花闪过之后你会有一刻的失明,整个段落观众被邱礼涛锁在逼仄的斗室,被看得快瞎眼的绿色滤镜、屏闪,黑暗中的乱斗,加上咄咄耳膜的高频率音响,轮番轰炸,观影体验真是别样的酸爽。感觉有一点点像《沉默的羔羊》最后来迪·福斯特黑暗中击毙杀人狂那段。

从90年代,邱礼涛就是香港电影的异色,20多年过去,《拆弹专家2》依然是那么异色,看他的电影我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过程又虐又刺激,之后又会盼望下一回!

的美好追求。三组孩子都有展示其梦想的专属空间:双胞胎是吊桥,方小琴是大树,任宇翔则是屋顶。当孩子们进入各自的专属空间时,便是他们袒露心灵、放飞梦想的时刻。他们的梦想里,有对父母归来的现实期盼,也有能听见绳子说话的浪漫想象。当看见双胞胎一本正经竖起耳朵倾听绳子说话时,人们不能不为孩子们的纯真所感动。

影片有许多充满诗意的场景。如孩子们早起到校,黑暗的山路上亮起一团团手电筒的光,这些光就像空中的点点星光,照亮了孩子们脚下的路,也照亮了他们的人生。又如孩子们出国比赛前向未能一同前往的杜老师告别:赶到渡口一字排开,面朝已然登船的杜老师一起跳绳。此场景如同《放牛班的春天》里学生在歌声中用纸飞机与老师告别,也如同《死亡诗社》里学生们站上桌子与老师的告别,形式不一,但都显现了学生们对老师的感激与热爱。

从《小鞋子》似的困境开始,《点点星光》中孩子们的生存状态最终超越了《小鞋子》。孩子们没有被现实所困,而是在老师和集体的教导与帮助下凭借跳绳开启了梦想,点亮了人生的道路。这当中有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与精神,更有无数人的默默奉献。(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